

全球商业中的人文教育

原创：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1月6日

2018年8月18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长江商学院和德国KSG基金会主办的2018第六届儒商论域会议，是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WCP）的特邀分会。在会上，杜维明、卢卡·斯卡兰蒂诺、莱辛格、项兵、赵东成、樊和平、姚新中、傅成玉、秦朔、周立等海内外知名学者与企业家们汇聚一堂，讨论了“精神人文主义”视域中的全球商业伦理展开的可能性、重要性与实践性，以及儒家哲学对于商业伦理的贡献等问题。接下来，本公众号将推出此次会议的演讲与圆桌会谈精编，作为一个系列推文以飨读者。



主题演讲：杜维明、卢卡·斯卡兰蒂诺、项兵、傅成玉、莱辛格、周立：精神人文主义视域中的全球商业伦理

第一场圆桌会谈：道德的，抑或伦理的？我们如何认识企业精神：“精神人文主义与全球伦理精神”

第二场圆桌会谈：现代性、全球化与地方性：“全球商业中的精神人文主义：和而不同的多样性”

导读：本文为本次儒商论域第三场圆桌会谈会速记整理稿。

主持人：王建宝博士（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圆桌嘉宾：

周立（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

霍华德·科恩（美国天普大学对话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秦朔（上海那拉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彭彦华（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学术主任、《孔子研究》的主编）

田茂永（《首席财务官》杂志出版人兼社长、总编辑）

主持人（王建宝）：我想请问周立院长，长江商学院已经做了十多年商业人文教育，不知道您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好的想法？



周立（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

周立：谢谢建宝，在座很多都是哲学家，也有很多企业家。这个话题又是讨论商学院的人文教育，我想从商学院讲起。以前讲得比较宽泛，今天专门讲我们为什么会在商学院讲人文教育这个题目。

商学院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1819年，世界上第一所商学院 ESCP-Europe（欧洲高等商学院）诞生于法国。美国第一所商学院是沃顿商学院，成立于1881年。这两所商学院都出现在社会大变动以后，前者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后者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后，之后经济开始起飞。两所商学院的创始人都是企业家，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那个时期商业、商人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们成立商学院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学生学习怎么经营企业，还有一方面要解决一些问题。像 ESCP，要解决商学院学员和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民主制度和社会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沃顿商学院的沃顿先生也提出，当时美国经济发展非常快，需要大批的经理人，因此他认为商学院必须要将商业与道德情操并重，这跟我们说的“利义兼顾”不谋而合。他还说，商学院的学生培养出来以后，

一定要具备用知识和财富为他人服务的愿望和能力。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的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了一些很深刻的问题。

我再讲一下哈佛的案例。哈佛是 1908 年成立商学院，成立之时，哈佛大学是不欢迎的，哈佛校友是不欢迎的。因为哈佛大学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哈佛校友觉得，商学院放到这么一个大学里边，表示哈佛在堕落。这个问题很早就有，沃顿在当时建议，商学院的学生是本科生，两年要在大学里面学人文课程，后两年才会学专业课程。他认为人文教育可以启迪学员，追求至善至美的愿望，可以享受人类心灵和知识的最高境界，所以人文课程在商学院创始初期非常重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发展，哈佛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哈佛商学院没有本科生，他们觉得人文教育应该在本科解决，也接受这种批评，所以创立了独特的案例教学。很多人认为，这种教学方式把人文的因素综合到里面去了。

下面讲两个卡耐基报告，这两个卡耐基报告对商学院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深刻的作用。第一个是 1959 年的卡耐基报告。这个时候，美国的公司发展得已经非常壮大了，但是卡耐基基金赞助的报告题目叫“美国商人的教育”，在那个时候深刻地批评了当时的案例教学，主要是批评其缺乏理论指导，他们提出了建议，叫做“用科学的范式来管理商学院”。从那个时候起，就比较注重所谓的科学，也叫做逻辑实证主义。主要是用学习自然科学的方式进行商学院的教学，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 2008 年。2008 年大家都知道，金融海啸以后，全球都在反思，商学院其实也在反思。第二个是 2011 年的卡耐基报告：这个时候要反思本科的教育，学院要学习专业，同时要学习人文，他提出的方式很有意思，借用 DNA 的方式，叫双螺旋结构（人文和管理人）。所以说，西方在这方面也不是白纸一块，它对这方面也是很重视的，有很多优点，他们也做了很多尝试。到目前为止，在 2008 年这个报告以后，很多商学院也开始选修一些人文课程，开设一些人文课程，但是很少涉及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哲学问题，大部分还是比较局部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人文课程里面基本上还是以西方为中心。另外主要是请商学院的同学到人文学院听课，而不是说像我们今天这样，这么有深度。

长江商学院为什么要做人文呢？原因今天谈到了很多。在全球范围内，企业家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非常重要。中国的企业家承担的命运更沉重。长江汇聚了很多企业的成功人士，我们肩负的责任就更重。所以长江在 2005 年只成立了 3 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全球视野、人文关怀”，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商学院的人文课程。我们开设了很多不同的人文课程，有哲学的，有历史、美术、音乐的，分门别类。其它院校也开始开设人文课程，有很多原因，我今天就不再说了。但是，2014 年，我们开始考虑，怎么样形成一个体系？怎么样形成一个商学院的人文课程体系？首先，人文课程在商学院的成功，是跟杜先生的领导、参与分不开的。另外，从事人文教学的人员和从事商业教学的人员，一定要有一个对接。建宝在这里面起了很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作用。我们想，一方面有杜先生这个原因。另一方面，我们确实认为，如果要开始的话，应该从哲学开始。因为今天讲到了，哲学是所有学科中最基本的学科。那么，从哲学开始，我们觉得应该可以从中国哲学开始。而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人文主义，中国哲学又从儒家开始，我们就决定从儒家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文化其实内化了很多诸子百家的优秀文化。只是儒家后来作为主导被吸纳了。最终，我们就落实到用精神人文主义来指导首期的人文课程（哲学课程），它涉及到企业的核心，就是己、群、天和地。



王建宝（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王建宝：谢谢发言人，刚刚讲了精神人文主义怎样在商界应用，以及长江商学院如何把精神人文主义融入到自己的人文教学当中。说到这里，我们想听一听来自美国的观点。我们接下来有请霍华德·科恩教授。霍华德·科恩教授今天代表的是美国天普大学对话研究中心，他是那边的执行主任。



左二为霍华德·科恩（美国天普大学对话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霍华德·科恩：我在天普大学的商学院教学，大概2年之前，我也加入到了沃顿的教学团队当中。我觉得哈佛对于商业教育的观点是非常特殊的，他们从来不提供本科学位的教育，只提供硕士、博士、博士后的教育。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从地理角度来讲，商学院其实跟大家所了解的哈佛主校园是有一河之隔的，它在查尔斯河的另外一边。所以，它跟整个哈佛也是分开的。商学院的教工在商业伦理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我刚到沃顿商学院的时候，讲的是公共领域管理，主要是联邦层面政府的管理。当时的院长认为沃顿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商学院，并且商学院的一个目标应该是帮助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更好地引领政府的事务。所以，当时我们所教的课程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关注人文主义的价值，像公民性、正义等等。我们的目标就是去培养未来企业的领导者，问题在于怎么样才能培养这些领导者。

我觉得其中非常有意思、也让人困扰的一个方式就是，我自己之前学习的专业是律师，你在医学院、牙科学院，还有其它学院，都会发现，这些人本科就是学这个学科的。但是在商学院，你会发现这些人可能从前从来没有过任何的商业经验。像我们天普大学福克斯商学院现在也会教很多的商业伦理课程，已经上了 10 多年，我也一直在过去的 10 年当中教这个课程。但是，我们这些课程的核心就在于要让学生出去能够找到工作。除此之外，我认为他们还需要非常强大的沟通能力，现在也需要把这一点纳入到课程当中，因此也会有一些涉及到交流沟通的课程。在任何沟通之前，人首先要了解自己，这个就会涉及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哲学问题，在东西方都有思考的一些哲学问题。第三，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自己的课程当中希望教授的就是批判思维与对话。也就是去通过批判的方式思考不同的问题，并且也能够跨过不同文化的桥梁，去跟不同背景的人、公司进行沟通和协商。

所以，整体课程的要求就是让学生能够成为更好的商界人士。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像比尔·盖茨自己，他是哈佛的辍学生，然后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据我了解，他每天至少会花 4 个小时的时间读书。不是读小说一类消遣的书，而是去读跟商业管理相关的书。他认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坚持不懈地去做正确的事情，我觉得这也体现了对于自己价值的坚持。

有一个核心问题：商学院的教师应该进行学术研究呢？还是应该在现实的商业网络当中工作呢？大家可能更多地关注他们的学术成就，以及他们现实的商业成就。然而，却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教学的质量，我们需要去重新检验教师的教学质量。之前也有人提到过，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群教师，他们能够结合现实生活当中的商业经验和教学本身。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会不爱听，但是我还想说，其实在商学院，学生是我们的客户，客户想学什么？比如说他们来自于中国的文化背景，他们可能是想来学习哲学的。但是，像有一些美国学生，可能就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花时间。所以，我们必须停下来想清楚，重新去分析，尤其是在西方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不断全球化的世界当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跟很多同事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美国的法学院如此成功？在中国也有一些法学院的项目，日本也有，为什么美国的这么成功呢？就是因为法学院没有一个特殊的领域分别，这些律师分布在各行各业，他们没有一个具体的系别。这就强迫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不要采用孤岛式的思维，美国大学最好的一个优势其实就在于此。我不太了解中国的大学，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跨越不同系之间孤岛式的存在。然而这一点很难做到。当我们真正去把人文思想付诸于实践过程中时，就会遇到像这样的困难。

我们现在探讨全球的商业伦理。其实关于伦理，我在我父亲身上学到很多。我之前是童子军的成员，多数的童子军成员不太会记得自己加入时候的初心。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行为准则第一要保持诚信。问题在于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同事和朋友能够信任自己。我自己的经验是，一旦你失去了他们的信任，就非常不太可能把这个信任再拿回来。

我自己课程当中，特别喜欢的一个话题，就是安然。安然之前是非常大的一个企业，但是倒闭了。如果说我们去研究一下安然的这些员工，你就会发现，安然的领导者自己只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来自于一个浸信会的家庭。问题在于什么呢？他领导的这个企业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道德的方式去工作，他们的腐败进一步波及到了成千上万的人。所

以,不管企业做到多大,关于企业领导者的道德课程是必须要永远存在的。不管教师在专业、经济和商业运作方面的教学能力如何,必须要在批判性思维和商业道德方面拥有足够优秀的教学能力。

王建宝: 刚才几位都是从学校的角度来谈商业伦理教育。我们现在请秦朔先生通过自媒体的角度,来看看如何发挥振人心、齐风俗的作用。



秦朔（上海那拉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秦朔: 谢谢,我到目前为止做了二十八九年的媒体。之前 25 年都是在体制内,最近 3 年在做自媒体。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商业人文教育的一个新的视角,是基于社会向度的一个项目观察。最近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疫苗,到现在为止,已经有 4000 多家 P2P 公司暴雷了,再加上资本市场也不景气,所以人家说九州都把这个“九”,改成韭菜的“韭”了。我们的环保也有很多问题,最近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在湖北汉江流域做了一个化工围城的报道,情况比以前改进了很多。2012 年,全国 1 年的废污水排放量 785 亿吨,其中有 400 亿吨是排进长江了。这是什么样的规模呢?相当于一条黄河的水量。

所以,今天中国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商学院作为一个培养商业人才的基地,应该去思考,商学院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一种伦理。我长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方面,长期来讲,一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他 1970 年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他反对企业承担股东责任之外的任何其他社会责任。二是以德鲁克为代表的,他在 1973 年所写的一本书里提到,企业的目的必须在企业之外,必须在社会之中。因为工商企业就是社会的一种器官。从这个意义来讲,企业的商业视野里,必须要融入社会向度的一些观察。当然,很多学者,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方向中,取他们的一个向度。比如哈佛大学的教授莱威特(音译),他认为社会问题让企业解决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必须赋予企业更大的权力,企业就会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政经社会的权力中心,这非常危险。也有另外的教授认为,企业不能仅仅承担一种简单的法律责任,应该履行 **Social stuff black**,对广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观点非常多,在此我不展开。从全球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还需要去探讨的问题。因为无论从联合国的《全球契约》,OECD 跨国公司的《指导纲领》,以及全球报告的倡议,还是从 SA8000 到挪威传奇社的 SO 的 26000,已经是一个实践中的东西了。

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讲，如果用中国的文化话语来概括，一个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角度，大概分成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0 阶段。核心含义大概是“利不害义”。你挣钱，但你不能作恶。为什么说这是 1.0 阶段？因为这是法律的要求。中国的《公司法》第 5 条、17 条、18 条有很明确的规定。2008 年，中国国家领导人也提出来，中国企业应该树立全球的责任观念，自觉将社会责任纳入经营战略，完善经营模式，追求经济效益的社会责任统一。2013 年开始，中国央企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已经全覆盖了。只要是央企，每一年必须发布这个报告。现在在中国的沪深 300，大概也有 100、200 家公司去发布这个东西，所以这不用去讨论。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的理解流派。比如有人认为，企业跟社会之间有一种潜在的契约。迈克波特（音译）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不仅仅是响应式的，社会有什么要求，你响应一下。现在扶贫吗？你就去扶贫。现在要乡村支教，你就搞一个教育基金。他认为更多是一种战略性的，要与企业的长期战略发展关联。而且他认为，两者可以统一。比如说，你的一些电子产品，外壳可以用可降解的玉米来做，本身又能够节俭成本，同时还可以环保。我觉得这是 1.0 的阶段，“利不害义”。

第二阶段：2.0 阶段。是“义利并举”。核心意思是说，企业要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去定义企业。社会的价值定义了企业存在的真正理由。传统商学院教的东西，有马斯洛分析、核心能力、比较优势等等。但我觉得，社会价值驱动的这样一个定位，现在其实没有充分的展开。比如说一个企业怎么基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怎么通过你的供应链，或者生态圈，让企业正向的价值能够外部化。然后，怎么创造更大的消费者剩余，然后消费者剩余减掉你对于社会成本的占用，这是一种商业文明的贡献，或者收益。我觉得互联网时代对于商业文明的发展，其实有很大很大的推动。因为很多互联网企业跟不购买就无法使用的商业产品是不一样的。它有很多的东西，是连接，是为社会而生，用之于社会。在这个基础上，商业价值反而成为了社会性、公共性价值的附属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义利并举”的企业要迈向一个商业文明阶段有 4 个步骤：第一，用正的方式获利。第二，用创新的方式创造消费者剩余。第三，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产生比较大的正外部性。第四，成为进步的阶梯，来回馈我们的社会。

那么，社会价值来源于哪里呢？我觉得来源于《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来源于 2015 年联合国发展峰会未来 15 年的 17 大目标。其实人类的一些基本社会价值在里面非常明确，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阶段。所以，“义利并举”的社会价值驱动企业，无论是愿景、使命，无论是运营、管理，它都会有一些独特的特征。

第三，3.0 阶段。就是要“以利兴义”、“以利弘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用企业家精神的方法，在社会价值和社会公共空间里面，去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案例，比如说易趣的创始人邵亦波，他创办了一个慈善基金，这个慈善基金不以盈利为第一目标，而是用科技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减少世界上的苦难。他做的 APP 投资是要解决人的焦虑、精神问题。中国的一些企业，比如说新泉基金，从 2008 年就开始按照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进行投资。每年的管理费提取 5% 作为专项基金，投入社会公益事业，而这个社会公益事业里面，形成了一套非常好的、完整的模式，非常专业。还有像方太这样的企业，现

在已经向社会发布跟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毫无关系的产品，比如说今年就发布了一个家庭幸福观，作为一个文化产品，告诉每个家庭怎么幸福。它在企业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实践，这样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外部化。

从国外来看，像孟加拉国尤努斯的企业社会创新实践，就是从股东利益最大化走向了社会价值利益最大化，他投资了二三十家社会创新企业。我采访过他，他的股东仅仅是以收回投资的股本为前提，而不再分红了。比如说跟巴斯夫去做防治蚊虫的特别低成本的蚊帐，比如说和达能合作，针对贫穷地区的孩子的低价酸奶等等。像 eBay 的创始人奥米迪亚，现在扎克伯格跟他的夫人陈·扎克伯格，他们的基金会，跟传统的做法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他们会拿出一部分钱，不再说做税后抵扣，而是把这些钱投资在那些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医疗等等方面，去全世界的很多地方做。非常典型的，像比尔·盖茨基金会，有催化式的慈善，是世界有史以来解决全球疫苗问题、解决非洲疫苗问题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通过企业家的精神，整合了各国政府，解决了受援国的问题，整合了很多科技发明的转移，整合了很多基金，包括很多受援国在发行疫苗债券，由世界银行去背书，已经真的解决了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用企业家精神直接去解决社会问题了，已经到了“因利而兴义”的新阶段。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大量的企业还停留在第一阶段，我不干坏事就行了。或者我干了坏事，往往会说别人也是这么干的，大家都这么弄的。我觉得中国的商业文明跟社会价值意义的承担才刚刚起步。但是，最近我们会观察到一个很大的现象，中国资本市场现在更多的是对海外开放，现在全球很多基金要进入中国投资，基于资本市场的压力，会慢慢使得中国公司更加考虑社会向度这样一个商业伦理塑造。我认为商学院应该从过去比较单向度考虑怎么做生意、怎么提升公司的股东价值，而转向人文教育的推动。最后我想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一句话跟大家一起分享：“以他者为念甚于为己之谋，抑己之私而行仁于外，人类天性之完善以此构成。”

王建宝：谢谢秦朔老师。因为他是扒着火车过来的，所以我让他全部讲完，不忍心打断他。秦老师讲的特别好，就像中国《易经》里说的：“利者，义之和也。”我们是儒商论域，也很荣幸请到了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学术主任、《孔子研究》的主编彭彦华教授。



彭彦华（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主任、《孔子研究》主编）

彭彦华：我也是前两天刚接到邀请，做了一些功课。这个论题我简单讲三点：第一，企业在发展核心技术的同时，需要提炼核心理念。第二，人文教育涵养企业文化。第三，企业文化是围绕人文教育的目标培育现代新型儒商。

我们现在的企业处于一个发展阶段，可能会有多种有意义的模式需要去尝试。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儒家伦理，可以作为一种尝试的模式，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比如说“天人合一”，利用这种思想，可以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发展企业。“治国平天下”，应行王道，不能行霸道。行王道，会使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之间和睦相处。行霸道，会引起战争、引起冲突。再就是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对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儒家说，生死富贵不是人的终极追求目标。什么是终极目标？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来增进社会福祉，这是终极目标。落实到企业上，以法治企业，以德教化人。

我们讲人文教育的涵养，什么是人文？古人有自己的解释，在《易经》第二十二卦贲卦上，贲就是装饰的意思，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到天文和人文，不能说配合得恰到好处。我们必须进行人文建设，来达到教化于天下。“文明以止”，就要需要外在的教育，让人明白“止”的道理。这个道理可以称为价值观或者价值基座。表现在人的身上，就是一种态度、一种作风，可以说是一种气概。

美国记者劳特斯曾经问李嘉诚，你成为华人首富，是因为你比别人勤劳，比别人聪明吗？李先生回答说，是气概。气概就是一个人的格局、一个人的高度。他再问，你这种气概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李嘉诚的回答，他非常感叹，说儿童时期读过《三字经》《千字文》《老子》《孟子》《论语》，这些东西弥足珍贵，使他终生受益。这些人文教育告诉了我们什么？心存敬畏。就是说学习经典，会体会到圣人的教诲，体会到格局和境界。我们在道的更高境界上要有所追求。

我们说中国哲学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心的问题，而人心是一切问题的根据。我们明心、净心的本质就是建设心灵品质的本质，要把心的漏洞补上，这样人才可以更加有力量。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什么意思？你不要放纵自己，不要扭曲自己，不要丧失自己，要实时把心收回来，把心存养好，有浩然之气，这样就不会失去目标，不会失去方向。再就是你要体验生命的快乐，学的快乐、交朋友的快乐，乐天、乐人的快乐，乐水、乐山的快乐。那么意识到人灵魂的高贵，这种生命快乐从哲学意义来讲，是一种内在的超越，是人生精神境界的一种追求。孔子就讲学不为了见之于别人，是为了自己而学，是成就自己，完善自己，是“学以成人”，是发现、开辟自己，以求自己的完成，是学做人，是自己学一个完善的人。所以我们说“下学而上达”，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提升。

杜先生是从天、地、群、己来讲，我更愿意从己、群、地、天说起。先说“己”，儒家有一系列鲜明的特质。“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这都是他的基本精神。人的追求有两种途径：一个求外在，一个求内在、求诸己。求外在，包括功名、富贵、利禄都有。孔子讲，“富而可求也”，要是“执鞭”我也愿意，但是有不确定性，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们抱的态度只能是只问耕耘，不为收获。有一句话，“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但是求诸己就不一样了，求内在我们可以把握，不能一生求得荣华富贵，我做一个人坦荡，堂堂正正的人，

经过我的努力可以达成。孟子有一句话，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再就是儒家讲的“内圣外王”，外王的基础是内圣。无论你是否可以开出外王，没有内圣什么也谈不上。孔子就把“己”看得很重，况且他的态度非常明确，说富贵也好，事功也好，你都要以堂堂正正的手段去取得。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个你不能当资本用，不能当投资用。“本乱而未治者否也。”再就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不怨天不尤人”、“反身而诚”。

再就是“群”。“群”就是忠恕之道。我们说修己、尽己、推己，这是一个过程。儒家是实证实修的，在实践中体悟的。再就是到“天”、“地”了，由“己”、“群”到“天”、“地”。我们说儒家的“己”并不是与外界无涉的，责任感是很强的。以天下为己任，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一个伟大抱负，怎么达成？一个是与他人的和谐，另外与宇宙万物的和谐。这样把己和群融化在宇宙和天地之间。

王建宝：谢谢彭教授，她也是我们今天会议唯一的一个女嘉宾，给我们揭示了人文的含义。彭教授讲的是《周易》第 22 卦的贲卦，下面是一个火，离卦，上面是一个山，艮卦，一个人爬到山上了，看到了下面的火，看到了光明，那就是中国人文的意思。。

现在请长江商学院 EMBA13 期校友，也是《首席财务官》杂志出版人兼社长、总编辑田茂永同学，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商学院的毕业生里面，他是如何把他的会计学和中国传统人文结合起来的。



田茂永（《首席财务官》杂志出版人兼社长、总编辑）

田茂永：非常感谢建宝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刚刚这一轮发言时，我注意到霍华德·科恩教授刚刚提到了一个案例，是爱尔兰那个案例。这是大概 2000 年到现在接近 20 年中最出名的一个财务案例。

我们今天用大量的时间来谈这个商业伦理，我为什么来呢？我想，来参加这个会也挺有趣的。中国所谓 360 行都有祖师爷，可能国外的朋友不一定知道，会计这个领域，中国有两

个开山鼻祖：第一个是大禹，是中国最早的一个治水的人，大禹治水封山的地方是绍兴的会稽山，5月份刚刚在那个地方开了世界会计论坛，“会稽”这两个字也是很有意思的。后来到了孔子的时候，孔子做过会计，孔子是第二个祖师爷。我们先说一下大禹留下的这两个字，实际上会稽的那个“稽”字，我认为是一个商业伦理的概念。“会”很简单，是一个汇总、计算的意思，古人讲“月计岁会”，就是每月出报表叫“计”。但是又叫“会”又叫“计”的时候，实际上把年报表、月报表讲了一次，这在中文里面表达是不恰当的，是一个重复的表达。原始的表达是“会稽”，这个“稽”是稽查的“稽”。大禹治水之后，在绍兴的会稽山分封诸侯。说对诸侯在治水当中的KPI进行考核，然后有赏有罚，是在这个地方，地名就叫会稽山。这个“稽”后来的演化，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商业伦理的缺失。“会”代表商业价值的计量，就是“量”的部分，“稽”是商业价值“质”的部分。这个字的演变，在国内2000多年来大家一直比较看重商业是逐利为上的认知中，埋下了这么一个伏笔。

到了孔子的时候，我看到相关文献，说他做过会计。《孟子·万章下》里面有这么一句，“孔子论会计”，叫“会计当而已矣。”这个会计做到“当”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当”更是一种商业伦理。什么叫“当”？我的理解相对粗浅一点：第一，社会层面你要合规。你要做得对，做得合规。第二，从宏观层面，你要做得准确。第三，从微观层面，做事人的层面叫操守。孔子觉得会计这个事没有什么态度可以谈，你做到“当”就可以了。反过来想，我们孔夫子先生对于商业伦理，用这个字来衡量，今天也是比较精确的。你做到“当”，什么是“当”？个人、企业与社会的发展，都要同步。像刚刚秦老师谈到的，各种向度彼此的融合。你又不能太超前，当然你也不能太滞后。

我们如果回看全人类的文明史，会计这件事情，是文明的开端。山洞里面的兽面人，6000年前的文字是计量山洞里存了什么东西，不讲什么事情，这个什么什么几个，那个什么什么几个，这是文字最早的来源。今天互联网技术已经发展很快了，流行的技术叫区块链。区块链叫分布式记帐技术，不是分布式文学技术，也不是分布式哲学技术，叫分布式记帐技术。我们看到，最先进的文字和最古老的文字，都指向了记录计量这样一件事情。我的思考，在当下互联网技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在大数据兴起之后，是否会对全世界的公司商业伦理造成巨大的冲击？我知道，至少中国很多领先的一些大数据互联网公司，已经出现了所谓大数据杀熟的状态。最近刚刚上市美国的一家企业“拼多多”，把商业伦理问题直接摆到了所有人无法不直视的面前。大家绕不开了。也就是说，商业的伦理在今天技术、市场的变化下，有没有新的东西？我们今天听了这么多东西。刚刚可能刘教授提了一点点。我们下次活动中是否能有更多的关于技术变革对全球商业伦理的冲击的讨论？我非常期待能听到真知灼见。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k97MNZ-H-BZHgtET3uObRw>